

懷李晉亭師（續完）

喬家才

娶女教師竟遭免職

十九年中原戰爭爆發，山西省黨部在太原存身不得，開始做第一次流亡省黨部，避難天津。等到閻馮聯軍失敗，閻伯川先生遠走大連，山西省黨部才以勝利者的姿態返回太原。戰後山西省政府改組，先由商啓予（震）將軍任省政府主席，後來改由徐次辰（永昌）將軍接任。中央為整頓山西教育，任命苗告實先生為教育廳廳長，他抱着很大的希望，很想有一番作為。當時太原的各省立公立中學的校長是這樣的：第一中學李晉亭，第一師範黃醴泉，國民師範梁先覺，陽興中學張聘珍，這幾位校長都具有辦好教育的經驗和決心，各學校都有一種蓬勃的氣象，假如假以時日，成效真是無法估計。

不幸，二十年（一九三一年）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，侵占我東北，全國愛國青年掀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怒潮，共產黨利用這個機會，暗中掌握操縱，這些無組織的羣衆變成共產黨的工具，成了反政府的組織力量。共產黨鼓動各地青年赴南京請願，增加政府的困擾，以為顛覆政

府的張本。太原的學生在共產黨分子戎伍勝等人領導之下，先向省政府請願，要求派專車送他們到南京，一變而為攻打省黨部，製造了穆光政慘案。山西的軍隊以慘案為藉口，佔領了省黨部，把正在省黨部工作的委員及工作同志拘留起來。晉亭先生和梁先覺先生都是省黨部的委員，在反國民黨的氣氛之下，校長當然幹不成了。山西省黨部解體以後，晉亭先生担負起省黨部的地下工作，祕密聯絡各縣的同志。這一段時間，環境非常惡劣，有隨時隨地被捕的危險，他冒險犯難，為黨工作，功勞不小。

七七事變，全面抗戰，山西教育界人士多半撤退到陝西，教育部為了收容山西的流亡青年和教職員，在陝西洋縣成立國立第七中學，由晉亭先生担任校長。國立七中在他領導之下，成了戰時的第一流中等學校，辦得有聲有色。後來因為他和女教員陳少白結婚，而被教育部免職。校長和女教員結婚，光明磊落，並不違犯國法，也沒有甚麼不妥當。當時晉亭先生祇有四十多歲，的確需要結婚，需要一個家。前些年台北建國中學校長賀詔新已經六十多歲，還和女教員萬紹吉結

婚，也沒有被台灣省教育廳和教育部免職或記過。可是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硬是把晉亭先生免職了。

李晉亭覺得對國民黨忠心耿耿，在陳先生領導之下，工作了好多年，沒有功勞，也有苦勞，現在不管學校的成績好壞，因為結婚這點私人的事情而被免職，傷心到萬分，發誓以後專辦私立學校，不再負公立學校的責任。

晉亭先生離開國立七中，專心辦理城固的平民中學。城固平民中是太原平民中在城固復校的，後來遷往漢中。漢中平民中在晉亭先生慘淡經營之下，成了陝南最優良的學校。學生讀書風氣很盛，尤其是守紀律，有禮貌，變換了氣質，贏得學生家長和社會人士的稱讚。

當時各公立學校的教職員因為待遇趕不上物價的飛漲，生活成了問題，居然因此罷教。平民中學經費困難，全靠學費維持，却沒有這些風波。能够安然上課。晉亭先生究竟施用甚麼魔術呢？有位漢中平民中學的學生曾昭普寫過一篇文章：「平民中開辦的一切經費，均靠收學費開支，除董事會捐募補助外，再無其他後台支援。而在當

時，通貨膨脹，所有陝南的公私立學校教員，全因為薪水不夠開支而罷教，但是平民中學却不被這種罷教之風所擾。因為我教是在每學期開學後，校長把所收的學費，除留少數辦公費以外，把老師一學期應得的薪水一齊發給。這樣老師們可以不受物價膨脹的剝削，可以安心教書。」

看了前面這一段敘述，可知晉亭先生的氣度是多麼恢宏，在特殊情況之下，辦教育的方法是多麼高明。一個沒有大手筆的人，能夠有這樣偉大的措施嗎？

嚴父慈母雙重作風

抗戰勝利以後，陝西地方人士以為像平民中學那樣的學校，不應當讓它遷走，堅決挽留，由地方人士接辦。教育事業是國家的，社會的，不應據為私有。晉亭先生把平民中學交給陝西地方人士，到達北平，去籌備大成中學。大成中學以張溥泉先生任董事長，李蔭翹先生任副董事長，晉亭先生任校長。後來溥泉先生逝世，由李蔭翹先生任董事長，韓希聖先生任副董事長。晉亭先生以辦山西省立一中、國立七中、漢中平中的一貫精神來辦大成中學，幕露藍蕓，煞費苦心。他借安德勝門裏的關岳廟為校址，地方寬敞，房屋很多，又有張武成、段禮庭幾位老朋友幫忙，假如不是大陸沈淪，大成中學是很有前途的。有一位來到台灣的大成中學學生張震，曾在一份刊物上發表過一篇描寫晉亭先生的文章：「我們的校長有嚴父慈母的雙重作風，對我們的生活非常關切。但在功課方面，一點也不放鬆。他早年畢

業於師大教育系，他的一生可以說一直在為教育奔走。不論春夏秋冬，他總是比我們起得早。我曾記得每天早晨上自習的時候，會發現一個高高身材，戴着一付近視眼鏡的人（晉亭先生並不近視），在院子裏來回踱着。他那和藹可親的面孔上，有時會對我們微笑。但當我們遲到的時候，他就會用一幅嚴肅的面孔看着我們，意思是說你遲到了，以後要早起一點。這就是我們的校長——李晉亭先生。」

晉亭先生被共產黨殺害，轉瞬二十五年了。所謂「穆光政慘案」，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呢？我要很客觀地把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，加以敘述，以了解共產黨製造所謂慘案，自己殺了人，回頭把罪名加到別人頭上，再加以殺害。

所謂穆光政慘案，遠因實在導源於十九年中原大戰。當時山西省黨部站在中央立場，堅決反對閻伯川先生聯合馮玉祥發動對中央的戰爭，一再勸阻閻先生無效。戰爭既然爆發，省黨部自然和閻伯川先生處於敵對地位。平心而論，十九年的中原大戰，是中華民國最不幸的一次戰爭，也是閻伯川先生一生的白璧之瑕。這一場戰爭，整整打了半年，消耗了很大的國力，國家的元氣也遭受很大的損傷。假如沒有十九年的中原大戰，張學良就不會統率東北軍進關，使東北成了真空，日本軍閥就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。即使他們發動了侵略戰爭，張學良為了東北軍自身的生存計，勢必起而抵抗，絕不會輕易放棄一寸土地的。而且由德國教官所訓練的新國防軍，教導師，也可以隨時開到東北，支援東北軍，抵抗侵略。

因為中原大戰，東北軍主力開進關內，使東北成了真空，日本軍閥才能如入無人之境，不費吹灰之力，沒有遭遇抵抗，很快佔領了我們的整個東北。而教導師也因十九年中原大戰，犧牲很大，沒有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力量了。

近年來，撰寫閻伯川先生事略或傳記，都避免提到十九年中原大戰一事。我覺得不論惹起戰爭的責任是在閻馮，還是中央，總歸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，用不着隱瞞。我們現在隱瞞了，寫歷史的人也不會放過的。「事前不忘，後事之師。」吃一次虧，長一次智。我們應當記起失敗的教訓，勉勵未來，又何必隱瞞呢。山西省黨部當年反對中原大戰，他們是站在中央方面，立場嚴正，理直氣壯，是無可非議的。而閻伯川先生不高與他們，也是人之常情。

苗姚胡韓反閻集團

十九年秋天戰爭結束，山西省黨部從天津搬回太原，主要負責人是苗告實、姚蓉軒、胡伯岳、韓希聖四位先生。二十年閻伯川先生想從大連返回他的老家五台河邊村，省黨部起來反對，他們反對的理由是怕反對中央的勢力死灰復燃。同情閻先生的人們則說冤仇宜解不宜結，對於一個已經失敗的人，連同老家都要反對，未免有些落井下石，不顧人情。因此人們把省黨部說成「苗姚胡韓」反閻集團。省黨部反對閻先生回山西，並沒有生效，閻先生終於回到他的老家河邊村了。並且仍舊可以控制山西的軍隊和政治。而閻先生和省黨部之間的仇恨也就越結越深了。

因為九一八事變，全國學生掀起到南京請願的浪潮，山西的學生自然不會例外。太原各學校的學生發起結隊遊行向省政府請願。當時我正好擔任太原平民中學的訓育工作，也領着學生們參加遊行。我們知道這次學生運動，已經被共產黨操縱，一定要發生事故，當學生隊伍到達省政府前面時，我們的學生站得很遠。祇聽到嘸嘸吵吵，亂紛紛地，學生代表向省政府請求，要求派專車送往南京請願。

省政府正在開會，推舉教育廳長向學生們講話安慰。可是，苗告寶先生一露面，就惹火燒身了。反對國民黨有了借口，共產黨的陰謀也就逐步實現。陰謀分子說國民黨阻止學生到南京去請願，一聲吆喝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運動，一變而為攻打教育廳，攻打省黨部的暴動。領導這次學生運動的，不是別人。就是毛澤東鬥爭劉少奇，附帶鬥垮鬥臭的戎伍勝。

戎伍勝率領學生隊伍攻打東緝虎營省黨部時，我也和一部分學生跟去，不過我們站的距離遠了一些，實際情形怎樣，我們看不清楚，也聽不清楚。據說一聲槍響，穆光政應聲倒地。我沒有聽到槍聲，祇看見省黨部前面亂做一團，有人喊叫，打死人了，一部分學生也散去了。一會兒，山西的軍隊，開到西緝虎營，佔領了省黨部，名為保護。請願的學生又吆喝着跑到倉門前二十二號韓希聖先生的公館，予以搗毀，還搶走了一部分東西。

穆光政慘案的由來

軍人奉了誰的命令佔領省黨部，我不太清楚。軍隊進入省黨部以後，立刻把在省黨部辦公的常務委員韓希聖、常務監察委員姚泰軒，監察委員李時齋，委員兼秘書蘇壽余和幾十位工作同志，統統囚禁起來，不准離開，要他們担負慘案的責任。沒有多久，又把他們押解到後霸陵橋警備司令部，正式看管起來。這一措施，正和共產黨的陰謀連成一氣，的確是很不高明的。況且死了一個穆光政，而要拘押四位省黨部的委員和幾個工作同志，小題大做，未免有些過火。顯然是政治恩怨，並不是甚麼法律問題。天下的事情，祇要摻雜上恩怨關係，夾雜上感情成分，就談不到是非公道了。

有人說省黨部的人太不機警，聽到學生們要攻打省黨部的消息，為甚麼不避開呢？假如他們避開風頭，頂多省黨部的傢俱和門窗被他們搗毀而已。不管是那一方面的陰謀，都會落了空，起不了甚麼作用。這話很對，一點兒也不錯。

穆光政並不在隊伍的頂前面，就說是省黨部開槍，也不會打死他。顯然是共產黨有計劃地製造慘案，暗地裏放黑槍，打死一個人，好栽誣省黨部。可憐的穆光政就在戎伍勝的陰謀之下，做了犧牲品，替死鬼，真是冤哉枉也。省黨部的衛隊長王和衆是我的小同鄉，又是一塊兒上黃埔的同學，我去警備司令部看他的時候，悄悄問他，他的衛隊究竟開過槍沒有？他說：「當學生們包圍省黨部的時候，怕發生意外，早就把子彈統統收回，衛隊沒有子彈，怎麼會打死人呢？」

警備司令渾源榮甲三（鴻臚）和省黨部的委

員們都是朋友，突然把他們關到他的警備司令部，覺得怪不好意思，悄悄地對姚泰軒先生說：「這一次的學潮，是閻先生做後盾的，我對諸位幫不上一點忙，非常抱歉，祇好暫時委屈幾天，不過在我職權範圍以內，我會盡量給諸位一些方便的。」

不管榮司令說的話是否可靠，慘案造成成功，在閻先生這方面，的確是求此不得的，正好利用慘案，打垮省黨部，以報他們反對他回河邊的一箭之仇。

到了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年），中央命令山西省政府把這案子移到開封地方法院審理，被囚禁的全體人員，一律送往開封。徐次辰主席不敢違抗中央命令，硬留着不放，祇好把他們送走。開封地方法院審問的結果，打死穆光政的子彈頭，和省黨部使用的子彈完全不一樣，證明打死穆光政的並不是省黨部，省黨部的任何人都沒有殺人的罪嫌，慘案的責任不應由山西省黨部來担負。審判結果，宣判無罪，姚李蘇韓四位委員和被囚的全體同志，才恢復了自由。閻伯川先生對於開封地方法院的判決，不管怎樣看法，山西省黨部却不能再回太原了，祇好做第二次的流亡省黨部。苗姚胡韓和閻伯川先生結下的冤仇，也就永遠解不開了。

誰又想到，經過十八年，共產黨會拿上穆光政慘案來殺害晉亭先生呢。慘案是共產黨製造的，却用來作為殺害國民黨同志的藉口，能不令人扼腕歎息嗎？能不令人憤怒痛恨嗎？能不為這位終身從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哀悼嗎？